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其生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丰子恺集

纳凉和避雨



丰子恺集：
纳凉和避雨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丰子恺集：纳凉和避雨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5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ISBN-7-5432-0144-5/I·15

定价：6.50 元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1913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熏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化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宁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恃，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挖苦的冲动。鲁迅骨子里

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不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興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

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季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合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卓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缺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宣叙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雄，未必都应

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囿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鹜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多。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轨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缩入短小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

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驯和俗谚相溶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赶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休整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

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领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在海派作家中，丰子恺是相当特别的，大概主要在他所提供的表现对象上，以及他对市井气的宽容态度上，他的海派神情才会显山露水。丰子恺（1898—1975），名润，字慈玉，浙江桐乡石门人。1914年以第三名考进浙江第一师范，受业于单不庵、李叔同和夏丏尊。1919年毕业后曾自费留日一年，专修西洋艺术。二十年代先后在上海师专、上虞春晖中学、立达学园等任教，1928年起任开明书店编辑。抗战爆发后，到桂林师范、宜山浙江大学和重庆国立艺专任教。

1943年后在家从事创作至1960年。

丰子恺最初以“漫画”知名。1922年已有随笔文字问世，而之后的《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刊物则正式向读书界昭告他的散文小品生命的诞生。至建国前，结集出版的主要有《缘缘堂随笔》（开明书店，1931年）、《中学生小品》（中学生书局，1932年）、《随笔二十篇》（天马书店，1934年）、《车厢社会》（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缘缘堂再笔》（开明书店，1937年）、《子恺近作散文集》（普益图书馆，1941年）、《教师日记》（崇德书店，1944年）、《率真集》（万叶书店，1946年）等。

丰子恺有一篇《二重生活》的文章，是为着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的，他觉悟到两者糅合的大势，但在他从曾经有所感受的日本，更从自己身居的上海滩的种种不调和相中，敏感于无尽的尴尬和滑稽。与此相关，他自叹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知天命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读〈读缘缘堂随笔〉》）无论二重生活，抑或二重人格，据此人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事标榜、大言不惭的时代还有着信守率真的人在，人的趣味和温暖还没有丧失殆尽。从散文小品的特殊角度看，人们大体也可以捉握到丰子恺创作上的兴趣和风格。

四十年代初，日本人吉川幸次郎说丰子恺是“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谷崎润一郎还把他的文章称为“艺术家的著作”。1979年，朱光潜在《缅怀丰子恺老友》中说，就人品和画品看，“子恺从顶至踵，浑身都是个艺术家”。这些意见在所有论评丰子恺的文字中最为切中肯綮，最有价值。丰

子恺确认“风景只宜远看，不宜身入其中”，“风景之美不在其中而在其外”（《实行的悲哀》）；他主“远功利”、“归平等”，相信“文艺创作是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读〈读缘缘堂随笔〉》）；他翻译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吁诉以艺术家的态度寻求“自由的乐趣”、“天真的乐趣”，“调剂平时生活的苦闷”（《艺术的馥果》）。这类立场一般会使人怀疑丰子恺海派文人的身分，他的好友、京派作家的理论旗帜朱光潜恰恰也拥有着这种艺术理想。问题在于丰子恺没有京派文人的清高和苛刻，在京派文人无情讽刺市井气息的地方，丰子恺则玩味和描写着，并且还发掘着其中的合理性。

对于人生、自然、宇宙的探究，是丰子恺从小就感兴趣的课题，他同李叔同（弘一法师）的因缘进一步发展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倾向，于是由艺术的距离走向宗教，企求同实际的丑恶人生保持着某种阻隔。在他看来惟有宗教“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因此“人的一切生活，都可以说是宗教的”（《“艺术的逃难”》）。他是最热中并最善于捕捉日常琐事的作家，他的宗教兴味使他的描绘平添了形形色色的哲理，老到的文字中不时会透出些禅意和飘然的气息来。

关于孩子，是丰子恺谈得最多的话头，也最见精神。平实地说，他的小品以三十年代写下的为最好，其中最突出的基本上都是写儿童的。对儿童的赞美，同对艺术和宗教的膜拜连成一气，构筑了丰子恺散文小品的顶点境界。他用憧憬理想世界的心眼做着这份功课，这是同现代中国一般重视儿童题材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得更透白，在一般作家歌颂儿童为着启蒙，在丰子恺则是为了寻得一个可以逃避恶浊现世的地方。他在《读〈读缘缘堂随笔〉》中有一

段话说得最明白，他说：

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没有注意身边琐事，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即没有做孩子的资格。孩子们呢，也大多被唱党歌，读遗嘱，讲演，竞赛，考试，分数……等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在这样“大人化”、“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的中国内，我的文章恐难得有人注意。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丰子恺沉痛的呼声，也是他神游于儿童世界的根本原委。

本集所选文章除个别文字误植予以改正外，均按原版排印，集名为编者所拟。

许道明

1994年10月

目 次

| | |
|-------------|----|
| 青年与自然..... | 1 |
| 渐..... | 8 |
| 颜面..... | 12 |
| 儿女..... | 16 |
| 姓..... | 20 |
| 忆儿时..... | 22 |
| 晨梦..... | 28 |
| 艺术三昧..... | 31 |
| 缘..... | 34 |
| 秋..... | 37 |
| 取名..... | 41 |
| 热天写稿..... | 44 |
| 吃瓜子..... | 47 |
| 给我的孩子们..... | 53 |
| 作父亲..... | 57 |
| 爱子之心..... | 61 |
| 春..... | 63 |
| 车厢社会..... | 67 |

| | |
|---------------|-----|
| 故乡 | 73 |
| 作客者言 | 76 |
| 肉腿 | 85 |
| 杨柳 | 89 |
| 闲 | 93 |
| 都会之音 | 103 |
| 谈自己的画 | 109 |
| 二重生活 | 119 |
| 午夜高楼 | 123 |
| 生机 | 127 |
| 山中避雨 | 130 |
| 纳凉闲话 | 133 |
| 手指 | 138 |
| 钱江看潮记 | 143 |
| 初冬浴日漫感 | 147 |
| 中国就像棵大树 | 150 |
| 宴会之苦 | 154 |
| 口中剿匪记 | 159 |
| 湖畔夜饮 | 162 |

青年与自然

英诗人瓦兹瓦斯[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里说道：“嫩草萌动的春天的田野所告我们的教训，比古今圣贤所说的法语指示我们更多的道理。”这正是赞美自然对人的感化力，又正是艺术教育的简要的解说，吾人每当花晨月夕，起无限的感兴。人生精神的发展，思想的进步，至理的觉悟，已往的忏悔，未来的企图，一切这等的动机，大都在这等花晨月夕的感兴中发生的。青年受自然的感化和暗示最多。青年是人生最中坚的、最精彩的、最有变化的一部分。青年一步步地踏进成人的境域去的时候，对于他们所天天接近而最不解的自然，容易发生种种的能动的疑问。这等疑问唤起了他们的无限的感想，这感想各人不同，各用以影响到自己的意志和行为。在孩儿时代，是感观主宰的时代，那时对自然所起的感情大都是受动的。在成人时代，阅世较深，现

实的境遇比较的固定，自然的感化也鲜能深入他们的肺腑，但不过有时引起一时的感兴。唯有极盛的青年期受自然的感化最多。

吾人所常接近的自然，如日月星辰，山川花木等，其中花和月最与人亲。在自然中，月仿佛是慈爱的圣母 Maria [马利亚]，花仿佛是绰约的女神 Aphrodite [阿佛洛忒]，常常对人作温和的微笑。

青年与月

吾人一切的感觉，最初是由“光”而起的。所以光的感化人比其他一切更大。例如曙光、晨星等，足以唤起人的宗教心。人对于光的注目，也比对其他一切更易。小孩生后数小时，就有明暗的感觉，数日，便能欢迎适当的光，半年，就能对洋灯微笑。这可以证明人类对光本来是欢迎的。不但幼时，成人喜光的证据也很多。例如妇人们不惜千金去购金刚石、明玉，蛮人集玻璃片或种种发光的东西来妆饰，都可以证明凡是生来有爱光的共通性的。

月是有光物体的一种。月的光有一种特有的性质。是天体中最切实的有兴味的东西。所以月给与青年的影响更大。

(一)月是宗教的感情的必要的创造者 在幻觉时代的孩儿，见了挂在天空中的明净的白玉盘，每起奇妙的无顿着的空想。所谓活物主义，便是他们把月拟人。以为月是太阳的亲戚，对月唱歌，对月舞蹈。他们以月为友，且以为月也是以友情对待儿童的，欢喜儿童在他月面歌舞，否则他便嫌寂寞。又或想象月里有神，有孩子群，有玩具。或梦想身入

月中，和月同游。在小儿话或歌中，常可以见到这种幻觉，到了十四五岁以后的青年期，变为更有力的感情。精神正当发达的青年对这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月亮所起的感想，是最有同情的关系于青年的精神的宗教的感情生活的。又青年对这纯洁无疵的月亮所起的感情，是最有密接的联络于青年的道德的生活的。儿童时代对月的荒唐的“空想”的本身，到青年时变形为“思慕”、“畏敬”和“求爱”，儿童时代的月中的存在的空想，到了青年期也变了一种力——自发的陶冶身心的力了。

精神发达的青年，对月所起的感想，关于客观的月的感想少，关于因对月而生起的主观方面的感想更多。夜本来是一日的最深沉的、最幽邃的一部分，就是一日的神秘的时间，又可说是人的退省时间。有月的夜，更容易诱起人的沉思和遐想。望月的人心灵似乎暂时脱离人境，逍遥于琼楼高处，因之此时外界的感触几于绝灭，内部的精神十分明了。此时往往诱起对于高泛的生命的无限的希望，将心灵迫近向宗教去。所以各人种的起初，大都以月为崇拜的对象，这感情到后来就变为对于“神”和“真”“善”“美”的感情。

(二)月暗示“爱” 月的团圆的形、月的温柔的光，和月下的天国似的世界，凡关于月的东西，无不和青年的神圣的“爱”相调和，且同性质的。心的爱的世界的状态，可以拿月夜的银灰色的世界来代表的。所以月夜的青年，容易被唤起爱的感情；月下追念亡父母或友人，在月中看出亡父母或友人的容颜。或者月下隐闻亡父母或友人的语声，又或想起离别的恋人或至友，乞月的传言寄语，在诗词中所常见的。“多磨恋爱”(stormy love)的青年，因月的感化，足以维持纯洁的精神，不致流于堕落或自弃。“多磨恋爱”的青年女子，往往对月暗诉她的困难的心事，向月祈愿，用这慰藉来鼓励